

也谈“戏仿”与“恶搞”

邱冬梅 | Qiu Dongmei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界“戏仿”与“恶搞”蔚然成风，在因特网和民间广为流播的各种戏仿性作品和戏仿段子，颇受读者的青睐和追捧。例如香港电影《大话西游》，就是通过对经典小说《西游记》的戏仿而成为“现代经典”的。而更多的“戏仿”或“恶搞”之作却引起轩然大波，如我国文学期刊《江南》于2003年第1期发表的以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为解构对象的同名小说，原作中早已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的抗日英雄阿庆嫂成了潘金莲式的人物，与胡传魁“司令”、新四军的指

导员都有两性关系，抗日英雄郭建光则是无计无谋的胆小鬼。于是引发一片哗然，被斥之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是“文明堕落的表现”，甚至要将作者送上法庭。前不久胡戈戏仿《无极》的搞笑之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也引起了原作导演陈凯歌的愤怒，斥之为“很无耻”！还宣称诉诸法律程序予以解决，却遭致网迷一片嘘声，网络甚至联名支持胡戈。近期又出现了戏仿“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的作品《潘冬子参赛记》，也遭致八一电影制片厂不满，认为这是对经典的不尊重，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版权。一时间，在中国文化圈，“恶搞”和“戏仿”成为一场文化“狂欢化”的壮举。

了解何谓“戏仿”，何谓“恶搞”，我们才能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认识这一在中国大陆持续升温的文化现象。关于戏仿的定义最早见于1598年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的《牛津英语辞典》：“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戏仿作为喜剧的一个分支，自古即有，最早出现于古希腊诗歌，在中国和罗马的古诗中均有大量模仿他人作品以制造幽默或讽刺效果例子。一般来说，一部作品有很大的影响，便会有人模仿。但模仿有两种：一种是复制原作的套路，就电影而言，这是产生电影类型的最初起因，另一种则是讽刺，由此产生特殊的戏仿喜剧。“恶搞”属于后一种，作者用借鉴、改造原作的方式在模仿原作的同时取笑原作，使其完全成为独立于原作的作品。

“戏仿”与“恶搞”在文学、音乐、绘画等所有文艺领域非常普遍。比较著名的戏仿行为，如1919年马塞尔·杜尚对达芬奇《蒙娜丽莎》的放肆“恶搞”——给名画复制品中的蒙娜丽莎画上两撇山羊胡子，杜尚以此来揭示现代世界中传统的虚假化，提倡一种后现代的先锋性。

巴赫金发现，中世纪的戏仿文学，如拉伯雷的创作，之所以洋溢着节日的自由自在和随意不拘，正是因为狂欢节期间准许把神圣之物“变为令人开心的降格游戏和玩笑的对象”。人们从对神祇的虔诚敬畏和现实生活的沉重束缚中摆脱出来，从所谓“永恒的”、“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严肃晦暗的范畴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欢快而自由地看待世界的诙谐观点，以及对未完成性、开



当一个社会只剩下娱乐和狂欢时，是令人深思和警觉的。

放性、交替和更新的愉悦。巴赫金的研究告诉我们，“戏仿”是一种“令人开心的降格游戏”。换言之，这“游戏”之所以令人开心，就因为它是对于虔诚、严肃、永恒、稳固、绝对、不可变更等神圣性的“降格”，为传统的高雅“脱冕”，从而在解脱羁绊和粉碎禁锢中获得自由的欢快。

今年4月29日，在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布什与模仿专家史蒂夫·布里奇共同出席了一年一度的第92届白宫记者协会颁奖晚会，并在晚会上发言。当天，史蒂夫·布里奇扮演的“布什”与现任总统一模一样的装束，惟妙惟肖的面孔，

连说话口气、动作都如出一辙。在晚会上，布什总统以一种礼貌、友好的口气向台下白宫记者“摆龙门阵”，布里奇则在一边“揭露”总统的心里话，以辛辣嘲讽的口吻戏说白宫家事，可谓是现场版的政治演讲之“戏仿”或“恶搞”。而布里奇却是应布什本人邀请前来晚会演这场“双簧”的，被“戏仿”或“恶搞”的对象本身主动参与其中，足见其对“戏仿”或“恶搞”的幽默心态和豁达气度。

我国自古以来就缺乏言论自由的传统，因此我们只习惯万众一声的赞誉或诟病。而戏仿是一种可以好话坏说或坏话好说的独特艺术，这就需要社会心理逐步接受。而如果没有幽默的心态、自嘲的精神、宽松的环境、法律的保护，戏仿这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是不可能发展的。

然而“戏仿”与“恶搞”是否意味着在宽容与欢呼声中被无限地接纳及发扬呢？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今年4月4日学院的法律保护专题讲座中谈到，必须要在大力提倡保护的同时对戏仿作品加以限制。要避免一些打着戏仿的幌子从事盗版的行为，以及一些以所谓戏仿的方式诋毁竞争对手，而形成不正当的竞争。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戏仿作品的良性发展，并加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法制的健全问题。

“戏仿”和“恶搞”是消费文化时代大众积极参与的表征，是公众对生活及生命充满热情地宣泄和表达，而精神消费的最高形式就是娱乐。于是，什么都可以“戏仿”和“恶搞”，有时甚至是为“戏仿”而“戏仿”，为了“恶搞”而“恶搞”。然而，当一个社会只剩下娱乐和狂欢时，却是令人深思和警觉的。马加爵杀人案都成了搞笑的对象，别斯兰人质事件也可以娱乐，似乎在搞笑浪潮风起云涌之际，是没有任何娱乐底线的。娱乐消解了一切责任感，带来的似乎是无边无际的民主自由感。但只依靠在狂欢中获得的表面自由，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孤独和内在的不自由，因为消除孤独和走向成熟获得的内在自由是需要责任、创造和爱的。也许在经历“戏仿”和“恶搞”的游戏、狂欢之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精神的茫无所依。END